

四川城市 经济改革 论文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四川城市经济改革论文选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四·十二·成都

四川城市经济改革论文选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字数：125千

1985年1月第一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1—4,100册

书号：4316·17

定价：1.10元

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很大成效。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我省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作了初步的分析、研究和总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我省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的改革已从农村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为了学习贯彻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选编了《四川城市经济改革论文选》。这本论文选的文章是从我省获奖的科研成果中选出的，它既有一定的质量，又有四川的特色。文章的内容涉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省城市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对广大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对广大干部，对广大从事改革和关心改革的人们，都是一本有益的读物。

城市的经济改革刚刚开始，随着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这一改革将全面展开。为此，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四川城市经济改革论文选》的以后各辑，希望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继续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深入城市经济改革的实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进一步搞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也希望广大读者对编好以后各集论文选提出宝贵意见，使它对城市经济改革起到有益的指导作用。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 四川省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林凌 (1)
四川省五个国营工业企业自负盈亏试点的调查
..... 冯举 周振华 (19)
四川省国营商业企业自负盈亏试点情况
..... 胡思学 秦福豫 郭恩良 (42)
试论军工企业走军民结合的道路 任俊 (54)
企业承载能力刍议 周天豹 (66)
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问题初探 杨永恩 (80)
发挥重庆经济中心的作用 林凌 郭元晞 (90)
要重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 过杰 张明远 (108)
关于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
问题的探讨 杜舍萼 丁学洲 (119)
论区域综合平衡改革 宋伍生 (130)
从马克思主义的流通理论看我国商业体制的
改革 黄宪章 (145)
对重庆工业品批发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
..... 重庆市商业经济学会一商局经济研究小组 (156)
价格全面改革的道路探索 黄长巩 (162)
试论多渠道经营和多种价格形式 尹可 (180)
关于工业品价格改革的初步设想 曾德久 (188)
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是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
关系的重大改革 康振农 (196)
企业以税代利、各级分享税收是完善分级财

政体制的方向	段秉仁 赵志优	(206)
对重庆市实行第二步利改税的设想	方大浩	(214)
改革信贷、利率管理提高流动资金使用的 经济效益	吴大成 刘安钧	(223)
会计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谭学模	(234)
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人民内部矛盾 ——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石德安 苏伟	(246)

四川省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林 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方针和任务。根据中央确定的方针，四川从一九七八年第四季度起，在工业、农业、物资、商业、计划、财政、银行等各个经济部门进行了广泛的改革试验，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本文拟就四川两年多来工业体制改革试验的成就与经验教训作一初步的探讨。

我国工业管理体制的最大弊病，一是权力过于集中，二是吃“大锅饭”，企业成了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把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束缚住了。要改革我们的体制，必须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入手。两年多来，四川从扩大六个工业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开始，逐步扩大试点规模和试点形式。到目前为止，省市（地）属工业的试点企业已达417个。这些企业的产值占全省地方工业产值的70%，利润占80%，上缴利润占90%。试点的好坏，对四川地方工业的发展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此外，中央各部在四川的一部分企业和大部分县属企业也进行了扩权的试验。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目标，是要把企业从现行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它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但这个目标一下子是达不到的，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分几步来走。我们的设想大体是这样：首先实行利润留成，相应地扩大企业在计划安排、产品销售、扩大再生产等方面的权力；进一步实行独立核算、以税代利、自负盈亏（这里需要说明，我所讲的自负盈亏，是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条件下，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自负盈亏。有同志叫它盈亏责任制，以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负盈亏相区别）；最后，在彻底改革财政、税收体制的基础上，打破部门、地区隶属关系，把企业进一步解放出来，使企业真正能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独立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现在四川多数试点企业还在走第一步，有10个企业试行自负盈亏。如果这种设想是可行的话，那么企业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

扩大企业自主权一开始涉及的问题就很多，主要有五个方面：要不要给企业一定的计划权，允不允许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之下，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要不要给企业一定的产品销售权，允不允许企业在市场上销售一部分产品，包括生产资料？要不要给企业一定的经济利益，允不允许企业根据经营好坏提留一部分利润作为企业基金？要不要给企业一定的扩大再生产的权力，允不允许企业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挖潜、革新、改造等内含的扩大再生产？要不要给企业一定的人事权，允不允许企业自行提拔干部、招收和辞退职工？

在现行体制下，要解决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到地方的计划、财政、物资、商业、劳动、人事等部门的权力，而这些部门的权力又受到中央有关部门规定的政策和规章制度的制

约。因此，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必然要求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让有关经济部门把相应的权力放给企业。这样，扩大企业自主权就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也为正确地进行改革提供了客观依据。

经过两年多的试验，四川围绕扩权在管理体制上有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

在计划体制上，过去企业只能按国家下达的指令性指标进行生产；现在，企业在国家计划之外，还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自订补充计划；对于国家计划中不适合市场需要的品种规格也可以修改。这对计划体制无疑是一项重要改革。

在物资体制上，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理论束缚已经打破，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短线产品和炸药等危险产品仍由国家统购统配外，大部分生产资料进入了流通领域，企业与企业之间可以不经过物资部门直接订立供货合同，也可以在市场上采购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在商业体制上，统购、选购、议购、自销等多种购销形式和多种流通渠道，以及全民、集体、个体、联营等多种经济成分，代替了商品的统购统销和独家经营体制。企业可以自销一部分产品，一些大的商店也可以不经过批发环节，直接从工厂进货。

在财政体制上，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体制开始冲破一个缺口。在国家利益占首位的前提下，企业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得到承认，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经营的好坏分享一定的利润，并且可以用来进行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改善职工的集体福利和给职工增发奖金。

在劳动体制上，企业有了选拔中层干部和批准职工加班之类的权力。招工择优录取和辞退职工等等权力，由于国家

要安排更多的人就业，实际上并未实现。

以上这些改革，使企业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五个方面的权力，即：部分计划权、部分产品销售权、利润提成权、利用自有资金扩大再生产权、部分劳动人事权。试行自负盈亏的企业，除获得比这些权力更大的权力外，还承担了因亏损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责任。从而使企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一个没有活力的、靠上级来拨动的“算盘珠”，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可以自行增殖的、能动的有机体。企业的这一变化具有极其深刻的、深远的意义。有了这一变化，整个经济就有活力了。

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进行体制改革的实践，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扩大给企业的权是多方面的，各种权力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经济管理体制也是一个整体，是由各种体制结成的一个网络，无论牵动那一个环节都要影响全局。因此，扩大企业的财权，必须相应扩大企业的计划权、产品销售权、扩大再生产权；在改革财政体制的同时，计划、物资、商业、劳动等体制必须跟着一起改。锣齐鼓不齐，这一台戏就没法唱。从这一点看，四川的改革是配套进行的。当然这还是一种小配套，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还得有新的、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配套才行。将来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需要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配套的方案，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在实施的时候，也可以考虑用不同程度的配套办法来进行，比如先小配套，后中配套，最后到大配套。我们设想，围绕扩权进行的改革，就可以说是一种小配套；围绕企业自负盈亏、改组联合，而实行价格、税制的改革，打破部门、地区隶属关系，就可以说是一种中配套；将来整个经济的组织结构、领导体制的改革，

可以说是一种大配套。当然，这种划分完全是一种设想，实践比这会复杂得多，但可以预见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进行体制改革，不配套、不同步固然不行，配套齐全后才进行改革也不行。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进行各种体制的改革过程中，一向认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异己力量——市场调节，进入了四川的经济生活，开始成为搞活经济的强大力量。

市场调节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了显著的作用：

传统理论认为，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不起调节作用。改革以后，企业在国家计划之外，还可以按市场需要来计划和进行生产。这样，市场的供求变化就开始在一定范围调节企业的生产，调节企业的资金使用方向，使企业从单纯为完成国家计划而工作，转变为满足市场需要，也就是为满足人们对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工作。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大大改变了长期以来无法改变的产需脱节的状况，说明生产领域离不开市场调节。

传统理论承认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的调节作用，但把它限制在消费资料流通的框框里，而把生产资料排斥在外；对消费资料实际上也是实行产品分配，造成严重的供需脱节。改革把大部分生产资料同样置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之下，让市场调节在流通领域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从而使供需脱节的状况得到显著的改善。

市场调节归根结底是个价格问题。虽然我们还没有进行价格结构的改革，但由于实行市场调节，现行的基本上是单一的计划价格结构实际上已经解体，开始出现四种价格形式：（一）固定价，基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相当大一部分商品，仍然实行国家规定的价格；（二）浮动价，主要是

一部分供过于求的生产资料，如机电产品等，在国家规定价格之下浮动；（三）协议价，主要是一部分供不应求的商品，有消费资料也有生产资料，由买卖双方协议形成的价格；（四）自由价，即农村集市贸易的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价格结构的这个变化，尽管使一部分物价有所上涨，但总起来看，它使得长期以来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变，为我们利用价格杠杆促进生产，为改革价格结构，开辟了道路。

市场调节最为显著的作用是对企业的经济利益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已经开始同它的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的大小联系起来。竞争能力强的，经济利益就大；竞争能力弱的，经济利益就小。这样一来，被传统观念认为是资本主义特征的竞争，就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在同行业企业之间。市场竞争象一种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 的推进器，它推动着企业千方百计生产质量优异、价格低廉、品种适销对路的产品，提供周到的服务，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不断督促着落后者提高技术，改进管理，向先进企业看齐。四川是全国工业发展比较落后的一个地区。地方工业的产品质量、品种远不如沿海。过去采取保护政策，限制沿海商品进入四川市场，以为这样四川的地方工业就可以发展起来。结果适得其反，保护了落后。现在竞争已经冲破这种保护政策，沿海地区的商品大量涌入四川，人们担心四川的地方工业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而事实却告诉我们，竞争一方面给四川地方工业带来严重威胁，但也带来一种任何行政力量都无法比拟的强大推动力。它激励着企业奋发图强，提高技术，改善经营管理。四川地方工业中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在全国范围的竞争中取得自己的地位。竞争在社会主义

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出现并取得积极的经济效果，说明竞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也有其存在的客观条件，只要有商品经济存在就有竞争，只是竞争的性质不同罢了。因此，社会主义并不排斥竞争，而是“保护竞争”。国务院发布的“保护竞争”的决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突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以上四个方面都说的是市场调节的作用。那么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如何开展呢？这个问题虽然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但并未因实行市场调节而使宏观经济失去控制。在生产上，国家并未废弃下达指令性计划，企业按市场需要生产的产品的产值，一九八〇年只占20%左右，这说明由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的生产仍占主导地位。在产品销售上，一九八〇年的商品零售总额中，通过国营商业以外的渠道销售的只占17%，其中工业自销占6%，这说明国营商业仍然是流通的主体。在价格上，主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以及其他大部分产品的价格，仍然为国家计划价格所控制。在实行计划调节和竞争中，由于计划指导不力，的确出现一些混乱现象，但不是主流。

伴随扩大企业自主权和竞争，企业开始冲破行业、地区、所有制等界限，在工业企业之间、工业企业与物资、商业企业之间、工业企业与农业企业之间、民用工业与军用工业之间、工业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横向联系，多种专业协作形式和经济联合体应运而生。其中有以共同协作生产一种产品为主的生产联合体，有共同销售产品的销售联合体，有组织产品协作配套的成套联合体，有共同协作进行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生产科研联合体，有加工农副产品的农工、农商的联合体，如兼营商业的农工商联合体。

到一九八〇年底，全省已组建各种企业性专业公司45个，总厂8个，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150个，参加的企业988个。在各种专业公司和经济联合体形成中，一个生产集中、资金集中的过程正在发生，由专业协作和联合而产生的新的生产力已显示出来。重庆钟表工业公司，过去花了十二年时间，投资1,700万元，才形成闹钟70万只、手表30万只的生产能力。去年以来，他们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同20个企业实行不同形式的联合经营，一年之内，就使闹钟产量达到100万只，增加43%，手表产量达到50万只，增加66%。

从四川专业协作和联合经营的发展看，专业协作和联合不是人为的产物，而是企业在竞争中为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而产生的内在需要。因此，搞好扩权和开展竞争，对推动专业协作和联合有重要意义。专业协作和联合经营，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只强调合理的分工协作，而否认和忽视各方面的经济利益，联合是建立不起来的。只有使各方面的利益在专业协作和联合中得到保护和扩大，联合才能成功。企业的地区、部门隶属关系是专业协作和联合的对立物，是专业协作和联合的最大障碍，必须破除这种隶属关系，使企业真正具有相对独立性，专业协作联合才有可能大规模展开，这就必须进一步进行以税代利的改革和其它方面的改革。

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专业协作和联合，必须自上而下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计划有步骤地来进行。如果我们能把国家机关自上而下的推动、组织、协调、干预同自下而上的“自由恋爱”这两方面联合起来，那么专业协作和联合的发展就顺利得多了。

在体制改革试验中，四川在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应当具

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设计和试行了五种国家与企业、三种企业与个人分配利润的形式。

国家与企业分配利润的五种形式是：1. 基数分成加增长分成；2. 全额分成；3. 自负盈亏；4. 亏损包干、微利包干；5. 县属企业四、三、三（四、四、二）分成。这五种形式都有效果，也都有缺陷。第一种，对国家和企业来说，利益分配都比较稳妥可靠，但因基数用环比法，影响企业不愿放手挖掘企业潜力。第二种办法简单方便，但因比例订得不妥，对国家利益有一定影响。第三种办法，经济效果显著，国家收入有保障，企业要担风险，但一个企业一个税率，不易推广。第四种办法，成效显著，重庆冶金局按一个行业包干，成效更大。第五种办法适合于县办小企业，但若实行以税代利，自负盈亏，效果会更好。

根据两年多来的实践，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缴纳工商税后的利润），需要规定出一个合理的量的界限。具体来说，就是企业由统收统支改为利润留成或自负盈亏后，企业的利润国家应当集中多少，留给企业多少；哪些开支由国家承担，哪些开支由企业负责，都应作出明确的划分，使之既能保证占首位的国家利益，又能保证合理的企业利益。否则，工业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企业与财政部门之间，就会因界限不明而发生争执，甚至引起对改革的不同评价。

确定这个量的界限，应当有客观依据。这个依据就是企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实行自负盈亏的条件下，应当拥有进行与简单再生产紧密联系的扩大再生产、举办职工集体福利、发放职工的工资和奖金的经济权力，也就是说，这三方面的费用都应由企业所得来开支。如果这个依据是正确的话，根据四川实践得出来的数字，把国家和企业

利润分配比例的量的界限大体定在80%与20%左右是相宜的。

但是国家与企业利润分配比例的大小，不但决定于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应有的经济权力，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财政收入的状况。从近期的情况看，企业所得比例的大小，只能以财政能否从当前企业利润的增长中收回米为度。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在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中，或收入虽未增长但支出相应减少的状况下，健康地发展。从四川两年的实践看，企业所得比例在10%左右，比较恰当。

企业与职工利益分配主要是三种形式：1.实行基数分成加增长分成的企业，职工的基本工资、法定奖金（占标准工资的12%）和集体福利基金（占工资总额11%），按原国家规定执行；另从企业利润留成中拨一部分用作集体福利和职工个人奖励。2.实行全额分成的企业，职工的基本工资按原规定执行、职工的集体福利和个人奖金全部由企业利润留成开支。3.实行自负盈亏的企业，职工的基本工资、奖金、集体福利基金等全部由企业税后利润开支。三种办法代表了三种企业与职工经济利益关系不同的密切程度。第三种办法最密切，第二种办法次之，第一种较小，但也比吃大锅饭要好得多。我主张，最终要实行第三种办法，使职工和企业真正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但一下做不到，可以考虑把上述三种办法作为三步来过渡。

扩大企业自主权，相应地产生了一个企业的重大问题由谁来决策的问题。我们的企业是社会主义企业，从理论上说，自然应当由工人来当家作主，但过去由于企业没有自主权，虽然讲工人参加管理，实际上是让工人完成上级下达的

任务，并不参加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扩大企业自主权解决了企业有权无权的问题，而有权以后，权由谁来行使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里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要明确解决企业的厂长和工人的关系。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厂长和工人之间存在一种从属关系，企业的经营状况往往取决于厂长的决策；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厂长则要对工人委员会负责。从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必须把职工代表大会逐步变成企业的权力机关，厂长作为职工管理企业的代表，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职工代表大会负责；同时在生产资料实行国家所有制的条件下，厂长又具有代表国家管理企业的身份，还应由国家任命，对国家负责。企业的重大问题由职工代表大会决策，厂长则参与整个决策过程，并执行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如果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违背国家利益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厂长有权要求复议，有权停止执行，报告上级处理。这样的决策体制看来更符合我国的实际。

以上这些改革，给四川的工农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试点第一年，八十四个地方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9%，利润增长33%，上缴利润增长21.2%，全部高于非试点企业。试点第二年，五个试行自负盈亏的企业显示出新的生命力，与一九七九年比，总产值增长41.7%，利润增长80.7%，上缴利润增长49.1%。实行利润留成的企业，由于一部分重工业企业能源短缺，任务严重不足，经济增长率不如一九七九年；但从改革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发展花色品种，改善服务条件，提高经济效益，满足社会需要等方面来看，则有了显著的进步。此外，企业的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住宅建设有了空前的发展，职工的个人收入也有较大的增加。还应看到，改革